

马华文学场域的原生态考察

——副刊研究建构的意义初探

〔马来西亚〕曾维龙

摘要: 本文尝试梳理马华文学副刊的沿革与发展历程,并探讨副刊研究作为马华文学研究重要的支点之一,对马华文学史以及马华文学的原生态研究所存在的意义。副刊研究的建构不仅可以丰富马华文学史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作为考察马华原生态文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同时也论述方修和杨松年的研究成果。在两位前辈的耕耘下,战前马华文学副刊研究已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战后的马华文学副刊研究却留有大量的空白。如何进一步建构马华文学副刊研究,以深化马华文学场域的内部和外延研究,并因应着马来西亚华文报章媒体生态的变化规律而调整研究方法,这是文学副刊研究当下的疑难。

关键词: 马华文学 副刊研究 文学场域 原生态文学 方修 杨松年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63(2013)1—0033—05

DOI 编码: 10.3969/j.issn.1008—0163.2013.01.008

一

副刊最早亦称“附刊”,是属于报章的部分。按杨松年所指“附刊”当为“副刊”的前身,“‘附刊’有二义:一对刊载新闻、评论之‘正张’而言;一指‘报纸附带出版的刊物’。”^[1]第一份由大报推出的附刊是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的《消闲报》,而后其它大报也竞相出版自己的副刊,其内容大都以酒后茶余的消遣文章为主。杨松年认为新马副刊《叻报》副刊《闲暇》、《檳城新报》副刊《檳城杂志》等皆受到自于中国报章副刊的影响。1919年,当方修所指称的马华新文学开始滥觞,副刊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传播作用。文学作品需要相应的读者,报刊自身就是重要的媒体,承担着资讯传播和报道的功能。其次是开拓文学场域,副刊无异提供了重要的管道和空间让创作者发表自己的作品。随着副刊编辑对读者(市场)的理解和思考的不同,很自然也会影响此一文学场域的发展。借用杨松年的话:

“报章副刊与期刊杂志是推动新马华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没有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当时的文学将处于怎么样的境况。”^[2]

早期新马华文报章的副刊夹杂各种文类作品。综合性的副刊是从1924年的《新国民日报》开始,辟有不同的专页版面——《小说世界》、《戏剧世界》、《儿童世界》和《诗歌世界》,所刊登的文类混杂,包含评论、散文、诗歌、小说、杂文等文体。然而在方修和杨松年的文学史论述中,真正的纯文艺副刊是从《新国民日报》的《南风》(1925年)开始,并以此为马华新文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副刊作为马华文学发生的场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下首先梳理马华文学副刊的沿革历程,其次讨论马华文学副刊研究的现状,以说明文学副刊研究当下的不足和其意义所在。

二

1970年代,方修所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

和马华文学史奠定了马华文学研究范式,以报章副刊、文学杂志为史料基础,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准则,归纳、概括和整理马华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和特点^[3]。他曾言:“马华文艺报刊的史的演进,与新文学本身的发展是相适应的。”^[4]在他所列举的战前马华文学萌芽时期(1919年至1925年)重要副刊,有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叻报的《文艺栏》和《叻报俱乐部》、南洋商报的《商余》、檳城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等几个^[5]。这些综合性副刊内容广泛,语言文白参半。1924年开始,《新国民日报》陆续开辟专门版面,有《小说世界》、《戏剧世界》、《儿童世界》和《诗歌世界》。新马华文报业副刊开始了新阶段,废除剪稿,开始大量采用本土作品。

方修认为1925年至1931年期间,这是马华文学史第二发展阶段——扩展期^[6]。附属在《新国民日报》的《南风》(1925年7月15日)、《叻报》的《星光》(1925年10月9日)以提倡严肃的文学姿态出发。其后的《先驱》(1925年12月)、《绿洲》(1926年)等文艺副刊也分别在《光华日报》和《南洋时报》发刊,带动了马华新文学兴盛的局面。直到二战爆发,诸多报章停刊为止。当时的文艺副刊“为数不下三百种,杰出的也有三、四十种”^[7]。

二战以后,新马两地政局出现了许多变化。二战时期停刊的大大小的华文报刊陆续复刊。1945年直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为止,共有64家不断复刊或创刊^[8]。马来亚独立以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中国报》、《建国日报》、《星报》、《新通报》(《马来亚通报》)等报章成为马来亚半岛华人社会的主流媒体。1965年,新马分家,原以新加坡为根基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吉隆坡先后设立分部,最后两地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逐步地各自为政。1969年,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正式独自经营,与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以姐妹报相称。1983年,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改名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两家报章实际上已不存在。1980年代,《建国日报》和《星报》停刊。1994年《新通报》(《马来亚通报》)因营运

问题,自动停办。华文报章的萎缩,自然影响副刊的存在。尤其1970年代开始,华文报馆经历现代化营利的转向,《南洋商报》以不断改进的技术,在印刷、排版方面取得优势。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占据了主要的华文读者市场^[9]。1990年代,《星洲日报》后来居上,在报份销量上与《南洋商报》平分秋色。2001年南洋报业集团为马华公会收购,2006年辗转并购在张晓卿的星洲媒体集团底下。自此《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中国报》、《光明日报》等主流报章,合并为同一集团,形成星洲媒体集团的垄断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副刊的生态也随之改变。报章除了日常新闻报导外,副刊沿袭着战前的规格,开辟不同类型的专门版面,以供读者投稿。直到1991年开始,报馆逐步计算机化以后,排版和印刷技术的跃进,促使副刊的呈献方法更加精致和多元。维系着马华文学生存的纯文艺副刊主要还是存在于各大报章之中,提供马华文学活动的各类信息和严肃文学的创作空间。1970年代的纯文艺副刊有着诸多改变,如《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从1973年开始改为《读者文艺》。1975年,由甄供主编的《文艺春秋》开始在《星洲日报》创刊。这两大纯文艺副刊板块支撑着马华文学两大板块。其他报章或是局限于某一区域,如《光华日报》主要面向北马的读者;或是改变市场策略,如《中国报》和《光明日报》定位于中下阶层的读者。副刊的格局也自然与报馆经营策略同调。1990年代还有一股趋势,即计算机和网际网络的普及化。尤其1990年代后期,不管《南洋商报》或是《星洲日报》,这两大华文报馆开始注重市场包装和营销。副刊各个专门版位趋向信息化、图像化和通俗娱乐化。除了严肃的纯文艺副刊和星期天的评论论坛以外,多元的互动书写现象已经不存在。纯文艺副刊成为小众读者的圈子,副刊的各个专栏也固定在一批作者圈子当中。

纵观以上新马华文报章副刊的发展历程,杨松年所说的战前文艺副刊的多样化,至1970年代以后随着华文媒体生态的改变进一步趋向小众化。但是作为马华文学场域的重要平台,

其作用依然集中在文学生产、传播的意义之上。

三

方修奠定了马华文学研究的规模,并系统地编撰战前马华文学史。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支撑其研究体系和文学史论述的重要支点就是报章副刊。一方面战前马华文学场域确实以报章副刊为主体。报章广大的传播功能,让社会各个阶层皆可轻易接触报章内容。作者最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读者阅读,报章成为重要的传播管道,副刊自然成为创作者和读者相互日常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影响着媒体生态的因素不仅仅是读者的多寡,同时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所赋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方修在大量的剪报史料中,所能挖掘的作品和回应必然与时代脉搏相吻合。由此而形成了方修的文学史观:文学必然反映社会现实,因而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去记录和描写这些事实^[10]。

从这个角度而论,副刊研究成为马华文学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因为从方修的观点来说,撰写文学史就不仅仅只是反映文学,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族群的文化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成为华人族群重要的情感符号的象征依托。方修编撰的10册本《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香港:世界出版社,1970年至1972年出版,2000年再版)成为星马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实质反映了华人社会的思想和情感想象的演变过程。易言之,副刊的史料价值在于其成为反映当时当地社会人文精神的重要依据。我们可以从散见于副刊中各类读者或创作者书写的文本中,窥见他们的情感和理念。

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变,副刊的内容越来越显得庞杂。前文已经叙述了马华文学副刊的沿革。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呈现战前马华文学副刊发展过程一个清楚脉络,端赖于方修和杨松年对副刊研究的深度挖掘。以上两位学者毫无疑问为马华副刊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如何将零散的史料拼凑恐怕是当中最具挑战的过程。方修选择了现实主义为他所信仰的价值体系以建构

《大系》和编撰文学史。面对着庞杂的和大量的史料,方修以作品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精神为标准进行筛选工程。换句话说,尚有众多作品在上述方修的标准下未能收录在《大系》之中,文学史的论述自然也会遗漏除了现实主义文学以外不同价值系统的文学类型。

杨松年在方修之后继续进行战前马华副刊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更趋向于严谨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他在1986年至1990年之间所出版的有关副刊研究的著述包括《战前新马报章文艺析论(甲集)》(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年8月初版)、《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年5月初版)以及《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乙集])》(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90年8月初版)。其中弥足珍贵的当属《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这是杨松年远赴伦敦大英博物馆搜集和整理的史料成果,以补充新加坡图书馆馆藏不足之处。杨松年的史料挖掘,提供在地的研究者重要的参考线索。根据以上他所整理的本土新马报章副刊史料,2000年和2001年间他出版了《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和《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2月第1版)。杨松年重新定义战前马华新文学的发展阶段,以文学作为镜像诠释华人社会的本土意识和侨民意识的转移及嬗变。

然而,战前和战后马华文学场域所面对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有着很大的不同,报馆的编辑方针随着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也自然进行了相应的变动。1970年代的《南洋商报》副刊除了前面所述的文学副刊《商余》、《读者文艺》之外,还有《新妇女》、《健康与生活》、《读者文艺》、《少年乐园》、《小说天地》等等园地。这些园地也夹杂着散文、诗、小说和杂文。这些作品文章能否称得上是文学?依据杨松年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副刊多层面的呈现甚至可以为人类学者提供充分的材料(文本),以分析社会文化的生活形态、习惯、价值标准等等,也可以为社会语言

学者提供关键词库,以研究社会日常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但是副刊研究对马华文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重构我们对马华文学史的认知。郭惠芬的著作《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她以战前出现在报章副刊中大量的作品为基础,再重新筛选和论述马华文学各类新诗的存在。她的论证实际上就是说明方修所建构的马华文学史中不足之处^[11]。从方法论上来说,郭惠芬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挖掘马华文学中既存的文学作品,同时也说明马华文学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元的系统,而不仅仅只有现实主义文学一种。

因此,重新思考副刊研究的意义或许可以进一步推进马华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修、杨松年和郭惠芬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把副刊研究归为马华文学史料学的一种。副刊研究的一个重要过程和步骤,就是把所有副刊重新整理,并且尽量让作品能系统地呈现出来。但是面对着每日大量的报刊,我们也知道史料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制定标准和进行筛选。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而言,副刊的编辑作业流程到最后决定刊登那些作品,基本上体现了报馆的集体意志,而不仅仅个别编辑的意志和认知,尤其1970年代以后的副刊版面出现了众多调整。1990年代至今的副刊,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例,这两份报章唯有《文艺春秋》/《星云》以及《读者文艺》(1985年后改为《南洋文艺》)^[12]/《商余》以文学专刊的姿态呈现。副刊其余专刊栏目无不以特定读者群为目标,仅仅提供相关领域的报告资讯即可,成为报章不折不扣附属性的专门杂志。媒体生态的改变也影响了副刊内容结构和存在意义。因此,战后马华文学的副刊研究可以从文学系统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挖掘其价值。遗憾的是战后马华的副刊研究,除了方修、李锦宗尚有持续零碎的收集和整理以外^[13],更进一步有关1950年代至今的副刊研究实际上尚有许多留白。一来要进行副刊研究首先必须面对浩瀚的报章史料,其次从方法论上基于研究者对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不同,因此侧重点也自然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副刊研究在马华文学研究领域无疑是最重要的支点之一。尤其在战前的马华文学场域中,个人文集的印刷和出版在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支持及成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出版品实际上非常有限。1980年代以前,报章副刊无疑是作品传播的最佳管道,也是创作者和读者互动的有效平台之一。当下的问题是,随着媒体性质的改变,报章不再是唯一的媒介后,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学的传播,甚至大有取代纸媒的趋向。因此,随着时代和物质条件的改变,我们也必须根据既有的社会环境条件调整我们对马华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问题意识。当然,马华文学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史料匮乏。然而,假如我们把马华文学设定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场域——有自己纵向的历史进展,也有横向的空间结构,在地的报章副刊无疑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同时也是这个场域的表现空间。副刊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了解马华文学的原生态状况,包括马华文学在地的生产、传播和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注释:

[1]、[2] 杨松年:《报章副刊与期刊杂志研究的意义:发刊词研究为例》,《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第20、22页。

[3] 方修把战前马华文学史自1920起年至1946年共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期(1919—1924)、扩展期(1925—1931)、低潮期(1932—1936)、繁盛期(1937—1945)。战后马华文学史也分为四个阶段:战后初期(1945年8月—1948年6月)、紧急状态初期(1948年6月—1953年9月)、反黄运动时期(1953年9月—1956年年底)和新马独立前后(1957—1970)。他的分期说主要体现在他所编着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1976)、《马华新文学简史》(新加坡:万里书局,1974)、《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加坡:T. K. Goh, 1978)当中。此外,方修毫不讳言,认为马华文学的主流就是现实主义传统。所谓现实主义,他认为至少有五类,即:(一)客观的现实主义、(二)批判的现实主义、(三)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四)新旧现实主义、(五)新现实主义,只是马华文学并没有出

现“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见方修：《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烘炉文化企业，1976年3月初版，第21页。

[4]、[5]、[6]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6年3月版，第4、4、41-44页。

[7]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析论（甲集）》，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年8月初版，第2页。

[8]叶观仕：《马新新闻史》，吉隆坡：韩江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系，1996年3月初版，第2页。

[9]根据叶观仕《马新新闻史》，1970年开始《南洋商报》的销售量与读者人数一直增加。他指出：“以1976年为例，读者比1975年增加了11%（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六的读者人数则增加了9%。当时，在西马的平均读者人数是60万8千人（占有华文报读者人数的51%），星期刊的读者人数是63万9千人（占西马华文读者人数的53%）。根据马来西亚市场研究公司（SRM）调查，由1976年1月至6月，《南洋商报》每天的平均总销数是9万6千70份。星期天的平均销数是11万7千632份。”1986年至1994年的读者销售量也就维持在15万份至19万份之间。叶观仕：《马新新闻史》，吉隆坡：韩江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系，1996年3月初版，第134页。

[10]方修对于历史主义的唯物观念可以从他以下一段话得到印证：“如果说反殖就是左翼，那整部马华文学史都是左翼。我认为写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去记录和描写往事。至于把写文章的人看成左翼或右翼，那就不是写历史的人所关心的。尽管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反殖都是左翼。我们却应该站在历史工作者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方修：《新马文学史丛谈》，新加坡：春

艺图书，1999年第1版，第31页。

[11]郭惠芬曾言道：“笔者在进行本论题的研究时，由于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以及从诗歌承传流变的过程来审视和探讨战前马华新诗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因而重新发掘一批具有美学价值和艺术特色的马华新诗，……。这些优秀的马华新诗作品在半个多世纪后重新现于世人的面前，有助于突破人们长期以来主要通过阅读方修选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六）·诗集》来了解战前马华新诗史的局限，也有助于扭转人们因为阅读该诗集的新诗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传统偏见，如认为战前马华新诗都是现实主义的。”见郭惠芬：《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2]1970年代中期开始，该版位由钟夏田负责编辑。1985年10月4日改为《南洋文艺》，并延用至今。1986年改组后，《南洋文艺》采取编委会制度，并征得陈雪风、慧适、晴川和叶啸出任委员。见李锦宗：《80年代的马华文坛》，吉隆坡：彩虹出版，1996年，第139页。

[13]方修和李锦宗以年鉴式的方法记录1970年代及1980年代整体的文学活动。其范畴还包括每一年度各类文艺书籍和刊物的出版、文艺副刊、文艺创作比赛和文学奖、文学出版基金、文学讲座和研讨会，以及文学社团动态。参阅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4月第1版）以及李锦宗《80年代的马华文坛》（吉隆坡：彩虹出版，1996年第1版）。

作者曾维龙，男，厦门大学中文系2009级博士生，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

第九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由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上海文艺出版社协办的第九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2012年12月7日至8日在上海好望角大酒店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西班牙、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文莱与中国香港、澳门等15个国家与地区近50位代表和国内70余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江曾培、黄孟文等出席了开幕式。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郑宗培致开幕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颔，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顾问、泰华作家司马攻等分别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贺信与铁凝主席的贺词。大会还收到了江苏、浙江、北京、广西、广东、四川、河北、黑龙江等省市微型小说、小小说学会的贺信、贺电。研讨会期间，还召开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第六次理事会会议，交流了各国各地的现状与问题；对理事会作了个别调整，泰国的梦莉、杨玲，瑞士的朱文辉，新加坡的林锦，美国的冰凌，香港的陈荭，中国的滕刚等增补进入理事会，担任有关职务；研讨会确定第十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将于2014年在马来西亚召开。

（丁年）